

陈安湖 著

为鲁迅

WEI LU XUN SHENG BIAN

声

辑

WEI LU XUN SHENG BIAN
WEI LU XUN SHENG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为鲁迅声辩

陈安湖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武汉

(鄂)新登字 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鲁迅声辩/陈安湖 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2

ISBN 7-5622-2484-6/I·178

I. 为…

II. 陈…

III. 鲁迅—研究

IV. I21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4524 号

为鲁迅声辩

© 陈安湖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桂子山 邮编:430079)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恒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责任编辑:黄明

责任校对:方汉交

封面设计:赖玮

印:姜勇华

开本:850×1168 1/32

版次:2001年12月第1版

印数:1-1000

印张:6.75 字数:175千字

2001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13.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自 序

这是我 80 年代中期至今的有关鲁迅的系列论文的结集。

这是一般所说的新时期,也就是开始于 70 年代末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期。12 亿中国人民,解放思想,奋发图强,取得了经济上持续 20 年高速发展的伟大成就,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国力,改善了人民生活,提高了国家的国际地位,使整个世界都看到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光辉前景。

20 年来的成就是令人兴奋的,但成就的得来却是不容易的,经过了 12 亿人民无数的艰辛劳动和不屈斗争,其中既有对大自然的斗争,也有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斗争。大家都知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开始就是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封锁中进行的。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从来不承认社会主义中国的存在,更不愿看到他的发展强大。改革开放以来,他们特别加强了对中国的思想和政治渗透,力图破坏中国的政治稳定,阻挡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直至最后颠覆中国的人民政权,彻底瓦解和分裂中国。

著名学者何新先生在《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一书中

痛切地剖析了美国对华的战略图谋。他指出，中美的对立，并不如一些天真的人所想象的仅仅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事实上，这是中美战略上根本利害的对立。美国绝不会容忍中国成为他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美国对华战略的真正目的，是诱导中国通过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方式，分裂解体，最终以垂直依附关系，纳入属于美国全球利益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系。”所以，即使中国变成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也绝不愿看到中国的统一、独立和强大，只希望中国“出现一个政治软弱、内部涣散分裂、无力依靠自身力量解决中国复杂经济社会问题的‘软’政府”，即“亲美并仰食美援的傀儡政权”，使中国永远处于贫穷、衰弱、屈辱的状态，无法成为美国的平等竞争对手。

何新的剖析明确而透彻，实在不免有点令人惊心动魄，但事实又证明他的剖析是千真万确的。眼前众所周知的例子是俄罗斯。美国在俄罗斯放弃了社会主义以后，并没有改变其原来的遏制政策，还是明里暗里，步步进逼，心毒手狠地继续摧毁他的经济，削弱他的军备，分裂他的国土。为什么呢？就因为俄罗斯仍然掌握着巨大的武器库，足以威胁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所以，可以想象，中国一旦放弃了社会主义，美国也绝不会停止其一贯的瓦解和分裂政策。中国的命运将同俄罗斯一样，甚至还不如。

然而，自然，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却是美国实现其战略图谋最先碰上的不可逾越的大障碍，首先必须摧毁

中国的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下一步的战略目标。然而他们又知道,社会主义已经和中国 12 亿人民的血肉联结在一起,从外部用武力是摧毁不了的;可行并且有效的办法,像从前对苏联一样,只有“和平演变”,即给中国大量输入西方的民主、人权和价值观念,冲垮中国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毛泽东曾经说过,要推翻一个政权,首先必须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是这样,反革命也是这样。何新把美国的民主、人权和价值观念看成是他们用以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武器,也是这个道理。中国 80 年代初的精神污染,以及后来的“新观念”“新方法”的盛行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哪一桩事没有美国的背景?哪一桩事不与美国的“和平演变”政策有关?何新回顾历史,不无感慨地指出:“大家可记得,1988 年的思想界是什么情况?种种崇洋媚外、主张全盘西化,而中国人对自己的文明传统自轻自贱、自虐、自我丑化的种种‘新观念’‘新方法’滚滚而来,有势不可挡之势!”有些作家“相信别人的挑拨和教唆,拼命挖中国革命的祖坟。有人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帮助西方搞垮中国、分裂中国的意识形态工具”。

应当承认,当年美国“和平演变”的政策是相当成功的,西方的民主、人权和价值观念给中国造成了空前的混乱就是证明。然而他们最关注的归根结蒂还是政权问题。所以在意识形态的演变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紧接着就策划政治演变。六四就是他们策划的结果。何新指出,民运“精英”们六四的口号是争民主、反腐败,然而“事

态的进程表明,他们要的既不是民主,也不是反腐败,惟一真正的目的就是权力。他们需要让形势乱下去,进一步乱下去,直到他们最终能够接管权力”。从意识形态演变到夺取政权,正是美国对华战略的必然逻辑。

对美国人来说,六四是失败了。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六四却没有完全过去。我们应该牢记,美国亡我之心是不会死的。他们第一次六四失败了,还有发动第二次、第三次六四的可能。毛泽东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斗争将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现在自由化思潮愈来愈深入地渗透了我们许多重要阵地,国家始终面临着严重的“和平演变”的局面。这是我们国家的最大隐患。隐患不除,国无宁日。

20年来激烈的思想和政治斗争,不但关乎12亿人民的命运,而且对我们这个时期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从事学术工作的人,并非个个都关注思想和政治斗争,更非个个都参与斗争,但都免不了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它的影响,而且在他们的研究活动中留下了或大或小的烙印。有些自由化人士就是兼搞学术研究的,他们很自然地要通过自己的研究活动推波助澜,把他们的所谓“新观念”“新方法”广为传播,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另外也有人在政治上并不属于自由派的行列,甚至有时还声称信奉马克思主义,但却分不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化思潮的界线,往往错误地把这思潮看成是真正民主和科学的思潮,所以也就有意无意地加以迎合,无形

中扩大了它的影响。

在学术界里,众所周知,鲁迅研究是一个最敏感、也最为人关注的重要领域。20年来,鲁迅研究受自由化思潮冲击最早,斗争也最为复杂而尖锐。有些自由化人士一开始就强烈地意识到鲁迅同他们针锋相对、水火不容,所以频频地发起了对他的攻击和毁谤,例如说他一生只会“借用文章整人”;他的打落水狗精神是封建专制主义;他的为民族解放牺牲自我的思想不符合“现代化社会所要求的以个人为主体的新人格”,有碍于“中国社会现代化”等等。然而他们中更多的人,慑于鲁迅巨大的战斗业绩和崇高威望,不敢正面攻击和否定他,而是用迂回的办法,按照自己的面貌和要求改造他,随意曲解和肢解他以欺骗一些不知底细的青年。他们笔下的鲁迅并非真的鲁迅,而是鲁迅的反面,例如当年曾有人为了利用鲁迅宣传资产阶级“纯审美”的理论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居然说什么鲁迅从来不把文学当作思想斗争和社会变革的武器,不主张作家为“革命的需要”“历史的需要”而写作。他的作品只讲审美,他的传统就是“纯审美”的传统,同五四以来的战斗传统是对立的。有些人迎合这思潮,就只讲鲁迅前期的进化论和个性主义,而不讲他后期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只讲他的彷徨、苦闷、失望和悲观,而不讲他的思想发展和斗争精神。有人还认为鲁迅始终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他所以成为世界文化伟人,就因为他始终坚持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与十九世纪欧洲的资产阶级思潮一脉相承的缘故。此外,还有人认为鲁迅是“全盘西

化”的始作俑者,与胡适之类毫无区别。像这样一些曲解和肢解,在80年代中后期特别盛行,风靡一时,影响不小。一种这样的著作或论文发表出来,必有大批追随者争相称颂,彼此响应,广为传播,或说是鲁迅研究的大突破,或说是鲁迅研究的旧时代的结束,新时代的开始。如果有人站出来与之争论,也必有大批人群起而打之,或斥为极左,或指为教条主义,或骂为陈旧保守,或说是“打击新生力量”,不一而足。

显然,这时期在鲁迅研究中的问题,不单纯是一般的学术问题,还涉及要不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甚至还涉及要不要社会主义的问题。有少数人,如上说的,表面上颂扬鲁迅,实际上是想利用鲁迅充当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工具。所以这时期的鲁迅研究,也程度不同地显示着整个思想战线斗争的投影,可以说成了思想战线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这集子里的文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的。文章的主题大都紧扣上述的曲解和肢解鲁迅的倾向。自然,我所议论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问题,所发表的也只是个人的见解;但书名为“为鲁迅声辩”,意思很明白,就是不赞成那些曲解和肢解,不赞成混淆鲁迅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界线,不赞成把他作为宣传自由化的工具。我的为鲁迅“声辩”,其实就是为鲁迅“辩诬”,清洗别人给他泼上的污水。虽然我不知道自己能“辩”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辩”的是否完全正确,但有一点是明白的,就是意在帮助人们破除迷雾,更好地认识鲁迅和保卫鲁迅。

就今天来说,保卫鲁迅,不仅仅是保卫鲁迅个人,也是保卫他毕生为之战斗的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我的文章,大多数曾在《文艺理论与批评》和其他一些刊物上发表过。由于发表时被认为是顶风之作,曾引起过不少非议,有时几成众矢之的,例如最早的一篇《鲁迅小说“新研究系统”商讨》,就被扣上“打击新生力量”的恶名;还引起过一些研究者的诘难。其他有些篇章,还受到个别人流氓无赖式的诟骂和攻击,这里就不必说了。

不过,20年来,肯定和支持我的工作的人,也是有的,除了发表我的文章的杂志的同仁外,还有各地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包括早年和鲁迅熟识的老同志以及长期从事鲁迅研究的前辈,往往以不同的方式表示对我的肯定和支持,使我增加了不少自信。这里,我要特别铭记和感谢著名作家、文学理论家李蕤同志,他一向关注我的工作,曾多次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书信里,也在一些学术研讨会上,热情推荐和声援我的工作。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不幸的是他已于1998年初因病去世,来不及看到我这文集的出版,令人不胜痛惜和遗憾。我要借此书出版的机会,以极其诚挚的心,表示我对李蕤同志永远的悼念和敬意。

2000年12月31日于琼山凤翔山庄

目 录

自序

鲁迅小说“新研究系统”商讨	1
关于鲁迅前期的进化论问题	33
写在王富仁同志的答辩之后	50
鲁迅与马克思主义	69
再论鲁迅小说“新研究系统”问题	82
《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的批判	100
论袁良骏鲁迅思想研究中的问题	120
辱骂——人格的自我失落	144
附：李蕤致陈安湖	150
关于“鲁迅研究的新路向”	153
关于鲁迅早期的个性解放思想问题	165
关于鲁迅早期的民主思想问题	188

鲁迅小说“新研究系统”商讨^①

1985年第3、4期《文学评论》发表了王富仁同志《〈呐喊〉〈彷徨〉综论》一文,集中清理了解放以来鲁迅小说的研究传统,明确提出创建“新研究系统”的主张。他认为解放几十年来“在我国逐渐形成”的、“以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态度的分析为纲,以对《呐喊》、《彷徨》客观政治意义阐释为主体的粗具脉络的《呐喊》、《彷徨》的研究系统”,虽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开展,也逐渐暴露出了它的一些严重缺陷;现在有必要以一个新的更完备的系统代替这个旧的系统”。这个“新研究系统”“不应当以毛泽东同志对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具体规律的理论结论为纲,而应当以鲁迅在当时实际的思想追求为纲”。王富仁同志的博士学位论文是一本20多万字的尚未出版的专著,《文学评论》登载的不过是约4万字的摘要。虽然是摘要,作者所要创建的“新研究系统”却已经表现得十分清楚了。

我个人读了这篇论文以后,感到作者确是有理论上的勇气,对鲁迅小说的研究也十分认真,敢于提出自己独特的新见。作者对于过去研究传统的缺点的批评,有许多是切中要害的;他提出“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口号,就纠正过去研究中的弊端这一点上看,也是有道理的。但我同时也感到,这个“新研究系统”还存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究竟它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新研究系统”,在理论上是否真正站得住脚,是否有利于发掘鲁迅小说的价值和意义,似乎还有些商讨的余地。下面我想就我个人所看到的几个问题,谈

① 本文刊登于《文艺理论与批评》1987年创刊号。

点不同意见。

—

王富仁同志的“新研究系统”中的中心,就是重新论定鲁迅小说(我这里所说的“鲁迅小说”,只指《呐喊》和《彷徨》,不包括《故事新编》,下同)“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他认为鲁迅“不是从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而是从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角度来反映现实和表现现实的”,他“描绘的重心不是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而是封建思想、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束缚”,“体现了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主要对象”,“深刻地表现了中国必须有一场深刻而广泛的思想革命,这个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清除封建思想在以农民群众为中心的广大社会群众中的根深蒂固的影响”。这就是他所以论定鲁迅小说为“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的主要根据,也是他对鲁迅小说“本体意义”的总的考察。

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意见有些不同。我当然并不认为应当否认鲁迅小说对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价值和意义。鲁迅小说也可以说是适应着五四文化革命的要求而写的,他揭露了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思想的吃人本质,鞭挞了国民性的弱点,这对于推动五四文化革命的深入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但它们的价值和意义是否仅仅是或主要是在这个方面呢?我认为不能这样说。这里首先有一个如何评价鲁迅小说的价值和意义的原则问题。

列宁在评价列夫·托尔斯泰时说过:“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末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列宁还就此批评了当时的一些资产阶级报刊,说他们“很少注意从俄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这个观点去分析他(指托尔斯泰)的作品”。列宁这里所说的“革命”难道是指思想革命么?当然不是,恰恰就是指政治革命。列宁说托尔斯泰

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这也是指政治革命。在列宁看来，托尔斯泰所以伟大，就因为他反映了当时俄国革命的一些本质方面，即“体现了整个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它的力量和它的弱点”^①。列宁在这里提出了一个评价作家作品的价值和意义的重要原则，就是看他同整个革命的关系，看他为革命提供了什么，看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我们自然不应否定思想革命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但人民取得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彻底解放，主要却要靠政治革命。不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旧的社会制度，人民既得不到政治上的解放，也得不到思想上的解放。所以政治革命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一个真正伟大的作家，他不但关心思想革命，而且以更大的热情关心政治革命。在他们心目中，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是不能分开的，而且思想革命必须服从于政治革命。

当然，作家的情况是复杂的，不能也不应以千篇一律的公式去硬套，但也不能以此为理由去否定列宁的原则。作家情况的复杂只说明我们应当灵活运用列宁的原则，而不能抛弃列宁的原则。

鲁迅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也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他的小说是适应着中国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要求的产物。当时，就全国人民（特别是他们的先进分子）来说，一个重大的历史任务，就是总结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揭露导致此次革命失败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使全国人民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方案不足以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引导中国革命走上胜利的道路。不管人们的阶级立场如何，只要他们揭露了这个历史真实，就有利于破除对资产阶级的幻想，巩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推动新民主主义的发展。

① 《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选集》第2卷上册。

鲁迅在《呐喊》和《彷徨》里正是这样做的。我们可以看到,鲁迅无论是描写农民或知识分子,都提出了有关现代中国革命和社会制度的重大问题,这主要就是揭露辛亥革命的弱点及其失败的必然性,揭露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揭露他们对农民力量的漠视。他的这些描写客观上证明了中国人民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的领导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对于帮助中国人民认识资产阶级的本质,认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及其共和国政治方案的软弱无力,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虽然鲁迅当时还没有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来观察中国革命问题,因而还不完全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不完全了解历史进程向中国人民所提出的新的革命任务;但他了解辛亥革命的失败,了解中国社会的黑暗和混乱,了解人民群众的苦痛及其不满的思想情绪,因而迫切地为中国探索一条新的革命道路。五四以来,以如此深刻的笔墨反映辛亥革命的弱点,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的,只有鲁迅一人而已。

王富仁同志说,鲁迅小说“深刻地表现了中国必须有一场深刻而广泛的思想革命”。我以为正确的说法应当是:鲁迅小说“深刻地表明了中国必须有一场深刻而广泛的民主革命”,其中既包括思想革命,也包括政治革命,而主要的是政治革命。虽然王富仁同志也承认鲁迅小说“所涉及的绝不仅止于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问题”,他自己“也绝不反对从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去分析它们的客观政治意义”,但事实上却没有去探讨它们的政治意义,而且还以相当轻视的口吻认定它们只有“有限的政治意义”。在王富仁同志看来,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对人民的主要统治手段,是封建伦理道德,而不是政治压迫,所以他就认为在地主阶级统治下解放人民主要得靠思想革命而不是靠政治革命,这就是他所以贬低政治革命的意义,乃至贬低鲁迅小说的政治意义的原因。我认为这种看法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还要论及),也不符合鲁迅小说的实际情况。鲁迅小说既写出了封建

伦理道德的吃人本质,写出了群众的不觉悟,同时也写出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群众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写出了农民群众毫无自由和政治权利的境况,写出了造成下层人民贫穷愚昧的整个封建制度的罪恶。这事实上就说明,中国必须首先进行一场深刻而彻底的民主革命,必须同压迫和剥削人民、使人民陷于贫穷愚昧的封建制度作斗争,同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作斗争,必须彻底粉碎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夺取他们的政权,从根本上改造社会的政治制度 and 经济制度。鲁迅小说正是在这个方面代表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代表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方向。应当说,它们的思想生命力和艺术生命力、它们的价值和意义首先而且主要表现在这个方面。

王富仁同志认为鲁迅重视的是思想革命而不是政治革命,他的“思想追求和艺术追求都是与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历史需要融合在一起”,而不与政治革命的历史需要融合在一起。据他说鲁迅“已经失望于辛亥革命那种脱离中国社会意识变革的单纯政权变革”,因此也就失去了对政治革命的关注和热情。这里我觉得有两个重要问题需要研究:一、辛亥革命是不是“那种脱离中国社会意识变革的单纯政权变革”?二、鲁迅是不是失望于“单纯政权变革”?

我想我们谈论问题总要讲点辩证法,不要把事情绝对化。历史告诉我们,世界上任何社会革命,都不会是“单纯政权变革”。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伴随着巨大的社会意识的变革。没有那些启蒙主义思想家关于人权平等学说和其他民主主义思想的宣传,革命是不会产生的;而革命发生之后又进一步推动了社会意识的更彻底的变革,从而又引起更广泛、更深刻的革命。辛亥革命同样如此。王富仁同志说:“辛亥革命发生于中国广泛的社会意识形态变革之前。”这话是不正确的。我们可以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思想革命重视很不够,没有在革命之前和革命之后(特别是

在革命之后)有意识地组织和坚持深入的思想革命,像五四思想革命那样;但在革命之前却又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变革,因为那时已经有了长时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传播,有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说的广泛宣传,后来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又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鲁迅在《人之历史》中说:“中国迹日,进化之语,几成常言。”^①可见当时中国社会意识变革是如何广泛而剧烈。这些,广义地讲,都是为辛亥革命作思想准备的。而直接为辛亥革命作思想准备的则是1905年前后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康梁保皇派的思想大论战。通过这场论战,在思想界比较彻底地清除了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影响,民主革命(当时也夹杂着民族革命)思想深入人心,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起了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先进的知识分子)的作用,这样才有1911年一举推翻清朝统治的胜利。而在革命之后,成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虽然是有名无实的),结束了君主专制统治,就更使民主主义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对帝王专制遗留下的许多腐朽的封建意识和习俗进行有力的冲击,使人民群众在思想上得到很大的解放;这对于以后的社会革命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这意义上说,没有辛亥革命,就不会有后来的五四运动。这说明,辛亥革命并不是“单纯政权变革”,在革命之前和革命之后,同样伴随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意识的变革。

当然,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都是不彻底的。我们研究这一段历史,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不应因此否定辛亥革命在推动社会意识形态变革方面所起的作用,而把它说成是一种“单纯政权变革”。

对于鲁迅对政权变革的态度,我以为应当作具体的历史分析,不能把问题简单化,笼统地说鲁迅“已经失望于辛亥革命那种脱离开中国社会意识变革的单纯政权变革”,那是不确当的。不错,由

① 《坟》,《鲁迅全集》第一卷。